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胡澎

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的国民也饱尝了战争带来的苦痛。对日本女性而言，战争不仅使她们生活在贫困线上，也由于她们的父亲、丈夫、恋人、兄弟、儿子在那场不义的战争中为天皇充当炮灰，战争对她们的伤害是伴随一生的。当时日本妇女是如何卷入战争的？在战争体制下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全力支持战争？支持战争的后果以及给日本女性自身又带来了什么？这些疑问始终困扰着笔者。现在，那场给中日两国交往历史留下沉痛一页的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体验过那场战争以及直接参与战争的人正相继离世，硝烟和炮火、屠杀和反抗似乎都已经离我们相当遥远。然而，反思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彻底追究战争的责任，考察战争与人的关系等问题在当前的和平环境中并未过时，对日本战时体制下的妇女进行研究也仍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日本战时体制下的妇女研究在日本妇女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对战时体制下日本妇女的研究是日本史学界的一个空白点。70年代以来受西方史学界影响，作为日本史学的一个分支日本妇女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战时体制下被称为“后方”的日本国内妇女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了相关书籍。不少学者在对战时体制研究时对战争进行反思，承担作为日本国民所应付有的战争责任，使得70年代末日本学术界对战时体制下妇女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研究妇女，“把妇女确立为历史的主体，必须把她们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去认识，基于她们所处的环境来解释产生这些行动的可能性。”¹本篇论文力图将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放到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中，试图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日本国民精神构造层面上寻找原因，以揭示日本妇女与那场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之间的关系。

日本妇女在战时体制下做了些什么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按照她们的主要生活空间可大致分为两部分：生活在日本国内的日本妇女和生活在日本以外的日本妇女。在战争期间有一些日本妇女志愿走向前线，扮演随军护士、后勤人员、殖民者的角色，有相当数量的随军慰安妇，也有少数人从事间谍工作，直接参与对战争的协助。如1943年陆军成立“女子通信队”，战败时有380人²。随军护士有“日本红十字社的救护看护妇”和“陆军看护妇”。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来，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日本红十字社派遣到陆海军的护士有960班，共计31450人。1937年有3500名陆军护士，战败时达到25000名。³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冲绳，花季的女学生们被推向了战场。1945年3月冲绳女师、女一高的教职员和女学生222名和18名职员被分配在陆军医院，上前线承担看护伤兵、运送弹药、搬运医疗器械、药品、食品的工作，被称为“姬百合部队”。当她们最后陷于美军的包围，解散命令下达时，219名女学生和职员死于战场或自杀。⁴随军慰安妇指的是战争期间没有人身自由，受骗或被迫充当日本军队性奴隶的军妓。除朝鲜、中国大陆以及台湾、东南亚等国慰安妇之外，日本也有相当数量的慰安妇。关于随军慰安妇人数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个与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密切相关特殊的群体——“满蒙开拓团”。满洲广袤的土地、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舆论编织的“大陆梦”吸引了日本贫苦农民和下层市民。为了奖励日本年轻女性嫁给满蒙开拓团青年，政府出台了“大陆的花嫁”（花嫁是新娘的意思）政策。1939年6月全日本各府县开办了培训“花嫁”的“女子拓殖讲席会”，许多年轻女性响应号召去了满洲。日本战败时居住在满洲的日本平民有150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女性。

本论文研究对象是战时体制下日本国内的妇女。针对在前线的日本男性而言，日本国内的妇女被称为“銃后之女”（銃是枪的意思，銃后指后方）。虽然在战争期间绝大多数日本妇女没有作为士兵到前线作战，却在日本国内积极致力于“后方”服务，从事支持战争的工作。成千上万被称为“军国之母”、“军国之妻”、“靖国之妻”、“军国少女”的日本女性证明了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妇女与侵略战争、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国防妇人会

在战争期间诸如爱国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大阪国防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选举肃政妇人联合会、大日本女子联合青年团等多个妇女团体和组织随着时局的进展，经历了由分散、竞争、对立到协作、合并的发展演变过程，战时体制下的妇女团体几乎囊括了日本国内的所有妇女，对战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下试以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为例进行分析。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32年3月18日的大阪国防妇人会，同年10月24日正式更名，是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异常活跃的一个妇女组织。创立者是大阪一位叫安田sei的家庭主妇。大阪国防妇人会的发起与一位叫做井上千代子的女性的自杀事件相连。她是大阪步兵第37连队所属的井上清一中尉的新婚妻子，为了勉励出征中国东北的丈夫，使之无后顾之忧地安心作战而自杀身亡。这件事在当时被报纸、杂志被广泛宣传，一时成为举国皆知的爱国“烈妇”典型。在井上夫人之死的感动下，安田sei和三谷英子与四、五十名家庭主妇成立了这一妇女组织。

大阪国防妇人会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1932年4月26日，这天从满洲“凯旋”归来的第二师团的新发田、会津若松的连队到达大阪港。在印着“大阪国防妇人会”大字的帐篷里，设置了茶水接待站，妇女会的会员们殷勤接待着走下栈桥的士兵们。这些家庭主妇的身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报纸首次以《国防妇人会的妇女欢迎队伍引人注目》为题进行了报道。⁵

1932年10月700余名穿着白围裙的妇女们聚集在东京白木屋礼堂，正式结成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伴随着日本侵略扩大化而急速发展起来。会员数急剧扩大，一年后发展到10多万，两年后发展到60万。会员不仅有主妇，还扩展到纺织女工、被服厂女工、商店女店员等各个领域的劳动妇女，连女艺人和妓女也加入到了这一组织中。1934年大阪市内国防妇人会的成

员有15万人，当时大阪有60万户，平均每四分之一户就有一名国防妇人会的会员。6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国内妇女团体的活动更加活跃，国防妇人会会员数也有了突飞猛进的上升。东京交通劳动组合妇女部就曾2000人集体入会。国防妇人会的人数由卢沟桥事变开始前的458万人，发展到最后接近1000万人，成为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妇女组织。

国防妇人会的幕后支持者是陆军省，当时象国防妇人会这样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妇女团体还有两个：厚生省监督指导下的爱国妇人会和文部省指导下的大日本联合妇人会。这三大妇女会于1942年合并成立大日本妇人会，会员发展到2000万。

国防妇人会的口号是“国防从厨房开始”。统一的服装是象征着家庭主妇日常生活的白色围裙，身上斜背白色宽带，上书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国防妇人会的目的是：秉承世界无与伦比的日本妇女的美德；不受反战等思想的迷惑；作为母亲培养对国家有用的孩子；作为主妇忍耐任何消费生活的窘迫；慰问前线士兵，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怀着一颗“母亲或姐妹之心”照顾伤病士兵和阵亡者的遗属。

一直被封建的“家”制度所禁锢，封闭在家庭中从事家务、育儿的日本妇女们，开始了她们在战争体制下的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生活”。国防妇人会的妇女们积极地从事着“战后奉仕”的活动。她们为了激发鼓舞士兵们的战斗意志，在街头收集缝制的“千人针”7赠送士兵；在港口、车站送他们出征；给出兵国外的士兵寄慰问袋、慰问状；迎接前线死亡的士兵骨灰；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士兵；将卖废品的钱作为国防金捐献……。国防妇人会在组织这些活动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她们为了“军队士兵”而充满热情地工作着，全身心地作为士兵服务，并没有将出去服务与金钱挂钩，而是作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她们把支持国家的战时体制看作高尚的事业，牢牢遵守日本的“妇德”，为国家培养对“皇国有用的孩子”。为了不让反战思想“妖言惑众”，也为了让兵士没有后顾之忧，成立了如“勇士之妻会”、“战后母亲之会”等一系列组织。

二、日本妇女在战争期间的作用

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妇女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被象国防妇人会这样的众多妇女团体吸收，激励士兵意志，起到了间接参与战争的作用。第二，补给战场上物资资源的消耗，也就是发挥在“经济战”中“战士”的作用。战争的长期化和扩大化使得日本民众生活水平直线下降，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在经济生活、国民生活等一切以战争为中心的战时体制下，减少消费成为日本国内妇女的主要工作之一。妇女会的干部们上街检查奢华的穿着以及被当作垃圾扔掉的还能使用的东西。和服也被一种近似于劳动服的裹着裤脚的服装取代。随着战线扩大，劳动力缺乏成为日趋深刻的问题。到了1939年形势对妇女的要求已经不足于减少消费，而是希望妇女去补充生产现场日益缺乏的劳动力。1930年女子劳动者数量是约150万，14年战争期间，增长了4倍，不但妇女参加工作的人数有变化，从事工作的范围也有很大变化。大多数一直由男性从事的工作岗位，妇女开始参加进来。从1936年到1941年的5年间，在机械制造等重工业领域工作的妇女人数增长了5倍。妇女不仅走向工厂，到1943年银行等金融机构、媒体、通信、交通相关部门也充斥了妇女的身影。1940年“大东亚共荣圈”口号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欲望膨胀到极点。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侵占中国大陆，而是建立一个囊括印度、缅甸、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大殖民帝国。为了将“大东亚圣战”继续下去，日本国内面临必须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经济战，而日本由于战线拉得过长，适龄男子大部分开往前线，无法承担国内的生产建设，因此，这一大规模的经济战的重担就落到了妇女身上。1941年11月，国民勤劳报国协力令规定，14岁到25岁的未婚女性，一年必须做30天的义务劳动。“战后之义务”到生产现场工作的人数，到战败时达到500-600万，其中有不少妇女是在军工厂工作。如果没有日本妇女在国内所进行的经济方面的支持，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会持续14年之久。第三，由于战场上消耗的人的资源受到很大损失，因此女性作为能够孕育生命的性别，在战时体制下发挥了作用。多生孩子，为国家养育下一代成为日本国内妇女的一个重要的职责。

日本妇女是怎样被卷入战时体制的

一直被禁锢在家庭中，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的日本妇女为什么会突然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到社会上从事各种“战后奉仕”的工作？她们是如何被卷入战时体制的呢？

日本妇女被卷入战时体制，客观上起到支持战争的作用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19世纪20年代末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二战前最严重、最深刻的一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也未能幸免。这场历时三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本来就尖锐的日本国内矛盾愈加突出。为摆脱经济危机、缓解国内矛盾，1931年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开始侵略中国东北，4个月后整个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二年1月28日发动上海事变，3月1日成立伪满洲国。30年代经济危机激化的国内矛盾被迅速转向了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国民的目光和关注点也迅速转移。日本妇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卷入了侵略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成立的大阪国防妇人会表明战时体制下日本妇女的活动与当时的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防妇人会表面上是妇女们自发的组织，但仅凭少数妇女的力量是无法也不可能组织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的。它的结成和运营从始至终有着军方的操纵和政府的引导。早在大阪国防妇人会的草创阶段，军方就开始参与策划。在大阪国防妇人会成立前，出席井上千代子的慰灵忌日等仪式的军方和媒体人士开始帮助策划妇女会成立，就连国防妇人会的统一服装——白色围裙也是军部领导指定的。可以说国防妇人会不过是军部的傀儡。1931年秋天，大阪国防妇人会在东京改名为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时，陆军省、海军省是后援单位。当局十分清楚没有日本国内妇女的支持，战争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军部操纵成立国防妇人会并不是为了妇女的解放，而是为了动员妇女参与战争。

战争，特别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为了保证因扩大战争规模而急需的庞大兵力和军需物资，1937年日本国内开始了法西斯总动员运动。8月14日，当局决定开展“国民的思想运动”，8月21日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日本政府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法西斯总动员运动使全体日本国民卷入了战争的漩涡，妇女活动也被迅速扩大化。9月28日妇选获得同盟（日本妇女争取选举权同盟）、基督教女子青年会日本同盟、全国友之会、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日本女医会、日本消费组合妇人协会、妇人同志会、妇人和平协会这八个“自主的妇女团体”组成了日本妇人团体联盟。成立的目的是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框架中实现妇女走向社会，但在客观上成为推进战争体制的一股力量。其领导人市川房枝和久布白落实分别在体制中身居要职。10月成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爱国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这三个“体制方面的妇女团体”参加了进来。1938年3月该联盟调查委员会制定了《家庭报国三纲领·实践十三要目》，三纲领分别为：创造健全的家庭；过适当而正确的生活；养育作为皇民的子女。而十三要目对妇女日常生活做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例如每天早上要向皇大神宫参拜，祈祷皇室的安泰；节日要正确悬挂国旗；服装以朴素为本，发型、仪容避免模仿西洋；婚庆、葬礼等家庭仪式要严肃、朴实等等。这是使妇女通过家庭来实现支持战争的政策。84月制定和通过了作为推行战时体制的根本措施《国家总动员法》。总动员法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言论出版以及工农运动等方面的内容，目的是要把全日本的经济、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都置于法西斯政府的控制之下，把全日本纳入战争轨道，建立法西斯天皇制国家。1940年第二次近卫内阁组成后，取缔所有政党，鼓吹一国一党的法西斯新党运动，建立大政翼赞会，在国内开展了建立政治和经济新体制的运动。近卫新体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在严密的翼赞体制下，所有组织和运动都要以对战争的支持为前提。法西斯妇女团体大日本妇人会就是在这一体制下由几个妇女团体合并而成的。所有年满20岁的女性被吸纳成为会员，不到20岁的女性被大日本女子联合青年团和大日本青少年团组织了起来。根据1940年9月的内务省训令，建立了部落会、町内会、邻组制度，大日本妇女会的活动被邻组活动吸收。1944年3月《女子挺身队制度强化方策要纲》被具体得以实施，8月《学徒动员令》和《女子挺身勤劳令》被法制化。前者规定了国民学校中等科以上男女学生要以学校为单位进行义务劳动，后者规定女学校同窗会等团体、市町村都要组织女子挺身队。到1945年8月战败时女子挺身队人数为47万2千余人。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呈现出了人口减少的倾向。因此，人的资源的确保和养育成为当时政府最关心的一件事。政府对妇女宣传遵守“家族制度的优良传统”，1938年实施了母子保护法，对抚养13岁以下儿童的母亲乃至祖母在生活、

养育、劳动、医疗四个方面予以扶助；同年设立了厚生省；1939年创立了人口问题研究所；1939年向医疗机构的女医生、女牙医、女药剂师、护士等发出了职业能力申报的要求，将其置于国家管理之下。1941年1月颁布了《人口政策确立纲要》，规定女性在21岁以前必须结婚，超过21岁还未结婚者以违法来论处。之后积极推进人口政策中奖励结婚和生孩子的措施。在日本政府提倡早婚的政策引导下，街头出现了号召妇女生孩子的“生育吧！繁殖吧！”的口号。日本妇女在战时体制下不仅被剥夺了生育的自主权，而且成为了侵略战争的生育工具。

日本政府深知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每一刻面临死亡的危险，而士兵的母亲们最容易走向反战，因此他们希望利用妇女组织把母亲的心煽动起来，让她们在后方支持战争，从而推动战争的顺利进行。1943年11月东条英机在日本放送协会发表关于妇女的广播演说。他强调了日本妇女在“圣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希望日本妇女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要通过家庭为国家效力”，发挥“日本的家族制度的优良传统”，建立“内助之功”，培养有忍耐精神的孩子。战争期间树立了许多“模范母亲”、“模范妻子”的典型，一时间“靖国之母”、“军国之母”之类的词语充斥报纸、杂志。在这样一个一切向战争倾斜的体制下，日本妇女在侵略战争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成为侵略战争的积极支持者，最后成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日本妇女被卷入战时体制的原因

一、妇女参与战争体制是日本妇女运动的歧途

日本妇女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幕末维新。在此之前日本妇女一直处于封建家长制的束缚之下。在明治维新文明开化政策引导下，一些启蒙思想家主张天赋人权，批判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女子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福泽谕吉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平等观；植木枝盛的废娼论、女性扩张论；本善治的一夫一妻制的提倡；森有礼的妇女观在当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还出现了岸田俊子、景山英子等民权女性。在早期妇女解放运动中，女子教育、基督教、废娼运动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大正民主运动时期掀开了日本妇女运动光辉的一页，出现了大批“新女性”。1913年新女性文学社团青踏社向旧道德、旧的妇女观进行了挑战。她们在文学杂志《青踏》中发出了“原始时代女性是太阳”的宣言，还编辑出版了妇女解放的讨论专集。妇女职业问题、母性保护问题、参政权的问题、卖春问题、教育问题、恋爱婚姻问题等被广泛议论和提及。1928年男子获得普通选举权后，争取妇女的参政权（参政权，结社权，公民权）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1930年第一次全日本妇选大会召开，之后每年一次在国会召开期间举行集会，要求赋予全日本妇女以参政权、公民权和结社权。

如果说在30年代以前的日本妇女运动走的是一条摆脱封建束缚，争取婚姻自由，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的话，“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妇女运动逐渐偏离了其目标，性质也发生了变化，逐步走上了一条完全背离明治以来妇女运动发展方向的歧途。那么日本妇女运动是怎样迷失方向，与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最终成为法西斯翼赞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支持这场侵略战争的呢？

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14年战争开始以来，在以往对妇女“贤妻良母”的“美德”要求之上，增加了妇女作为一个国民“为国献力”的内容。“统后奉公”、“统后护理”是对日本妇女提出的新要求。男人在前线，女人在“后方”这一侵略战争的综合战使得家庭“家”变成了国家的“家”，至此以“家庭”为界限内外性别角色分工一下子扩大成为以“国家”为界限的男女性别分工。象国防妇人会这样的妇女组织，赋予了日本妇女们“解放”和“平等”的梦想。妇女们由于有“为国家”、“为士兵”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理直气壮地走出家门，而曾深受封建家族制“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的男人们也认可了妇女走上街头，抛头露面。一直被束缚在家中的妇女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另外，无论是上层社会的女性还是下层劳动妇女都穿着同样的白色围裙，这给了各阶层妇女一种平等的幻觉，特别是给了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工厂女工、受人歧视的妓女们以“平等”的幻象。她们认为国防妇人会这样的妇女团体给了她们解放和表现自己的机会，其中当时的妇女运动领导人、女界精英们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当时的妇女运动家们把融入战时体制当作是一种妇女解放，对战争采取不抵抗，甚至支持、合作的态度。日本妇女解放运动的前辈市川房枝，是受过当时对女性最好教育的女界精英，她曾一直致力于妇女获得参政权运动。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为妇女运动向何处去而陷入矛盾。“看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中战争转入全面化，内心有深深的忧虑。”⁹，她清楚地看到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反对战争被抓去坐牢。二是停止一切活动，让妇女运动半途而废。三是先认清形势，再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表示支持。市川房枝选择的是第三条路。她在当时曾多次谈到妇女解放的问题，如1937年8月在她访问爱知县农村时，看到村小学成立国防妇人会分会，认为国防妇人会的干部们有不少在活动中发现了新的自我。认为从前很少当众讲话的妇女，由于参加了国防妇人会而发挥了自己的潜能。她说“过去没有自己时间的农村妇女，半天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听讲演，仅就此点就是妇女的解放。”¹⁰她还在《市川房枝自传》中写到：“国防妇人会的妇女们精神抖擞地走向社会难道不是一种妇女解放吗。”将妇女参与战时体制与妇女解放等同起来。在对待日本战时体制下的“女子征用”问题上，妇女运动家也认为“女子征用”是与妇女的走向社会以及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一致的。“国防从厨房开始”这一口号并不是要让妇女真正从厨房解放出来，而是强调厨房也同样重要。国防妇人会外表装扮成革命的、进步的、领导日本妇女走向解放，实际上却充斥着旧思想，是相当保守的反动的组织。军部希望妇女们认识到国防的重要性，把后方工作做好。

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并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之路，被动员，被对方思想利用，参与战争也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而是一种解放的幻象。战时体制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存在着天生的弱点，很容易走上“妇女间接参加战争=妇女解放的道路”这一歧路，走向对战争的翼赞。战时体制下的妇女运动使得许多妇女走向社会，为天皇制国家服务。她们所焕发的能量没有转向对天皇制国家体制的变革，而是支持了侵略战争，推动了军国主义的发展；没能使日本妇女获得应有的解放而是使之深受创伤。

二、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对日本妇女的影响

战争期间的日本妇女在对战争积极支持过程中，很少有人想到那场战争的性质，在她们看来，送自己的丈夫、兄弟、恋人去战场是为了国家，在日本国内从事“统后奉公”也是为了国家。战时体制下日本妇女与国家的紧密的结合离不开明治以来的国家主义教育。

日本国家主义通过教育对女性产生影响应追溯到明治时期。明治政府建立了基于“举国皆学”原则的国民教育体制。1872年颁布《学制》，赋予全国女子同男子同样的就学机会。明治自由民权运动后，明治政府趋向保守。文部省实行国家主义的教育政策，强调教育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由于男女同学，所以这一教育政策不但影响了男性也对女性构成影响。1881年5月制定的《小学教育规则纲领》，把“修身课”从过去的末位提高到第一位，历史课以培养尊王爱国精神为目的。6月制定《小学教员须知》，要求小学教员教育学生要遵循敬忠皇室、热爱国家、孝敬父母、尊敬师长、信任朋友、同情幼小等人伦之道。政府先后制定《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学校令》四个教育法令，从小学到大学，系统地灌输尊皇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天皇观的思想。1890年《教育敕语》发布，规定了教育的基本方针，向学生灌输忠孝思想和为天皇献身的精神。天皇制和家父长制是国民生活规范的两大支柱，基于天皇制的君臣关系是日本“国体之精华”，也是教育的根本。《教育敕语》发布前后，全日本和学校配布了天皇和皇后的照片，男女学生经过供奉照片的地方，都要鞠躬行礼。明治后期，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和对外侵略的需要，国家主义的教育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明治时期对女性的要求基本属于“贤妻良母”主义，到了20世纪10年代后半期，在平冢雷鸟和与谢野晶子之间有一场“母性保护论争”。平冢认为母性对国家有着重要意义，国家应对母亲在经济等方面给予保障。她这样说道：“自古以来，母亲就是生命的源泉。女人成为母亲的那天起，就不再属于她个人，而成为一种社会、国家的存在。保护母亲的措施不仅至关女人个人的幸福，也通过孩子，关乎全社会的幸福、全人类的未来。”¹¹她还写道：“孩子即便是自己生的，也不是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社会和国家的。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对国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以及将来的国家命运有着极大的关系。生育、养育孩子这一母亲的工作，并不仅是个人的工作，也是社会的、国家的工作。”¹²而与谢野晶子则认为片面强调孩子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对个性、对母性的泯灭和扼杀。这场论争对当时的妇女影响很大，特别是平冢的观点密切了国家与女性的关系。

在三、四十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猖獗时期，政府极力宣扬日本的“国体”以及“国体思想”。即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后裔，初代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祖先，“天皇万世一系”，“君民一体”。渲染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的优秀、诋毁其他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直接导致了日本国民的自我认识和对亚洲的认识发生严重偏差；导致了民众对天皇发动的“圣战”的支持。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都是在明治以来教育方针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天皇对于日本妇女来说是一种神的存在，天皇的号召没有理由不去服从。对天皇的绝对权威的膜拜和服从造就了日本战时体制下的妇女精神的扭曲。可见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天皇制等都对日本妇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妇女的毒害更是不容忽视。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思想，封建武士道精神等都是军国主义发展的土壤和温床。明治中期，随着天皇制体制的日趋完善和在不断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军国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三宅雪岭的“国粹保存主义”、高山 牛的“日本主义”等理论使得国家主义思潮上升，成为影响日本社会的主流，也为军国主义的膨胀打下了基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向国民灌输一种美化侵略战争的实质，为侵略找寻理由的思想意识。即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弱肉强食的年代，为保全日本的国家独立，致力于建立近代国家，只能走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的道路。军事发展成为近代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做“大东亚共荣圈”盟主成为近代日本全力追求的国家发展目标。在这一思想意识影响下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以帝国主义国家的面目向亚洲诸国扩张势力，走上了侵略之路。

在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教育之下，妇女将自己的命运、生活与天皇制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灭私奉公”的要求下，在认为妇女间接参与战争、为战争服务是必要的这一国家意识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把自己完全融入国家意识和爱国意识中，积极响应天皇的号召，投身到支持战争、为战争服务的运动中了。对妇女而言，这是一条可悲的通向地狱之路，母亲们将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线，支持他们去残杀邻国无辜生命，为天皇充当炮灰，还认为自己是正在为国家尽力效忠。

三、舆论对日本妇女的导向

30年代日本政府走上了一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强化法西斯统治之路。为了维持独裁统治，驱使日本国民为侵略战争卖命，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摧残一切进步的文化事业，封杀社会主义思想和一切民主思想，大搞天皇崇拜、“忠君爱国”，企图将日本国民的思想统一到天皇制的意识形态上的法西斯统治。三、四十年代的报纸、杂志极力宣传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思想上愚弄日本国民。政府还在舆论界培养了一批为法西斯天皇统治服务的文人。他们所写的文章、作品严重歪曲事实，掩盖日本军队在被侵略国家所犯的罪行，赞美军国主义，愚弄日本国民。1937年7月，《中央公论》杂志社派作家林房雄、尾崎士郎到中国采访，1938年末《主妇之友》杂志社派吉屋信子作为皇军慰问特派员到天津、通州、上海采访，撰写歌颂日军侵华的报告文学，还组织了一批反动文人参加了侵略南京、武汉的作战。当时的日本文化界在法西斯当局的推动下，写了大量的极力鼓吹侵略战争、激励人们“爱国心”的法西斯文学作品，出版了颂扬妇女自我牺牲、支持战争，如《军国日本典型妇女美谈》之类的书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文化界的一些人参加陆军和海军派往前线的“笔杆部队”，到战场去创作日本军队的“英雄事迹”。其中有两位当时红极一时的女作家林芙美子和吉屋信子。她们的从军记中充斥了对日本军人的赞美，歌颂战争的“崇高的美感”，但对被屠杀的中国兵士、对遭受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民、对化为废墟的城市充满了冷漠。回国后，她们在大阪、东京出席“攻克武汉报告会”，并进行了演讲。在演讲中呼吁：“我希望日本的年轻女性在国家这一重大的历史时期更加点燃爱国热情。”¹³她们贯彻了日本当局的思想，起到了让“后方之女”支持战争的作用。

在舆论的错误导向下，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支持达到了狂热化地步。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民众赞美日本军队是“忠勇无双的皇军”，连夜提着灯笼游行。民众特别是女性对军队、士兵的感情直线升温。据1933年1月的报纸报道，对东京女学生所做的问卷调查表明，希望选择的未来丈夫是军人的女性大幅度增加。年轻的母亲把自己的孩子打扮成小士兵的样子：男孩子穿军装，女孩子则穿白色的随军护士服。在强大的舆论导向和错误的社会思潮旋涡中，日本国民逐渐丧失了思考和判断力。侵略战争——这一在别国践踏生命尊严、掠夺物质资源的人类的犯罪在当时的日本国内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升华为一种“正义的”和“崇高的”国家行为，每一国民的个性行为都转到了为这一国家行为服务的体系中。

四、强烈的集团意识对日本妇女心理及行动的束缚

日本人的 interpersonal 关系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强烈的集团意识，这可以说是日本民族国民性中最突出的部分。集团意识的内容是集团高于个人和对权威的服从。战争期间法西斯军国主义为了动员全国民众为侵略战争服务，强调“灭私奉公”，完全否认国民的个人生活。在战时体制下，对战争的支持不可能是妇女个人的行为，而是集体行为。妇女们被一个个妇女团体组织起来，这些支持战争的妇女团体象一部运转着的庞大机器，作为个体的妇女不可能不被卷入，而且一旦被卷入便会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推着往前走，没有办法停下来。集团意识是妇女在战时体制下参与战争的一个涉及国民深层心理的问题，它使得妇女在法西斯妇女团体中与政局、体制保持一致。例如，当时国家对妇女的要求之一是为国家生育孩子，培养为天皇和国家效忠的臣民，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把孩子献给国家。在妇女团体，乃至国家这样一个大的集团中，作为个体的母亲必须绝对服从这一集团意识，即便是送孩子到战场去死也应该欣慰和骄傲，而不能考虑什么是否值得的问题或战争的性质。

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高压统治使得少数反战人士被捕入狱，一些人不得不选择了沉默，但大多数人则为了生存而被卷入战时体制。有的民间妇女团体因反战被解散，有的正义和进步的妇女运动领导人被捕入狱。在当时妇女团体必须要选择支持战争才能存在下去。一些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反对法西斯战争的妇女精英也都缄口不言，默认这场战争。在妇女会这样的集团中很难听到对战争的疑问，很难听到与不同于政府的反战的声音。

在战时体制下，几乎全日本的成年女性都被大日本妇人会这一庞大的组织所吸收，在一个如此庞大的集团中支持翼赞体制，这一现象表明日本人国民性中的强烈的集团意识已经被发挥到了极致。集团意识发展到如此地步就是对人性、对理性的抹杀。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这场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避免“一亿人总忏悔”的战争责任观，也不能仅看到日本民众是战争的牺牲者和受害者。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日本女性是战争的牺牲者、受害者，但也是侵略战争的间接参与者和支持者。正如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所指出的，战争罪恶是“日本民族在军国主义疯狂中所犯的罪，是必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的历史重责”。在追究道义上的责任方面，日本国民应承担罪责。日本妇女也应对战争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这种责任表现在战争期间，妇女团体、妇女运动家乃至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们所追求的目标都与当时的政府是一致的，而且日本妇女一直在努力与政府保持一致。与政府、强权过度保持一致是一种政治行为。

她们所全力支持的男人们在被侵略国家强奸、残害妇女；设立慰安所，发泄兽欲，蹂躏妇女。但这些日本军人却要求国内的妻子娴淑、保持贞操。作为女性，当时的日本妇女无视被害国女性的悲惨命运和日本男性的所作所为，全力支持这场不义之战。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孕育生命的女性，本应对践踏、毁灭生命尊严的战争采取反对和抵制的态度但却转向支持战争，这是日本妇女的悲哀，也是日本民族的悲哀。

主要参考书目：

藤井忠俊《国防妇人会》岩波书店 1985年4月
女性的现在研究会《后方笔记》JAC出版 1977年
永原和子 米田佐代子著《女性的昭和史》有斐阁 1986年
芳贺登《近代日本妇女》弘文馆 1986年
山田光《女性解放的思想家们》青木书店1987年
东京历史科学研究会 妇人运动史部会《妇女与战争——战争怎样改变了妇女的生活》昭和出版 1991年

近代女性史研究会《妇女们的近代》柏书房 1978年

河野信子《近代女性精神史》大和书房 1982年

战时下日本社会研究会《战时下的日本——昭和前期的历史社会学》行路社 1992年

女性史综合研究会《日本女性史—近代》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

宫城荣昌 大井minobu《日本女性史》吉川弘文馆 1978年12月

井 碧《“日本”国家与女性》青弓社 2000年

铃木裕子《女性史的开拓》(一.二)未来社 1989年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电话：64014021 传真：64014022 E-mail：ijs@cass.org.cn